

古人“冬闲”时忙着干什么

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。入冬以后，农事渐少，古人称这段时间为“冬闲”。冬闲时古人都会做什么？从古籍记载来看，“冬闲”时，其实古人并不闲着：女性“学做女功”，男性“习射练武”，上不起正规学校的孩子们则选择“冬学”……

壹

冬闲时女性“学做女功”

《女论语》：“针线粗率，为人所攻”

在古代，尚没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，人们的衣着、鞋袜、巾包什么的，要靠手工缝制，破了也得手工缝补——这个任务，在男耕女织型社会分工中，便落到心灵手巧、吃苦耐劳的女性身上。因此，“冬闲”正是古代女孩学习做针线活儿的好机会。针线活儿又叫“女功”，还有“妇功”“女工”“女事”“女红”等多种叫法，皆是指针线、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。

“女功”是古代流行的一个概念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就有这么一个说法：“黼黻文绣之美，疏布之尚，反女功之始也。”唐诗人于鹄《寄卢仝员外秋衣词》中亦称：“篋中有秋帛，裁作远客衣。缝制虽女功，尽度手自持。”

一般情况下，古代女孩子到了十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做针线活了。据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娩听从，执麻枲，治丝茧，织紵、组、紃，学女事以共衣服。”大概意思是说，女孩子到了十岁就不能再外出游玩了，得开始培养自己的淑女品德和性格，习练制作麻绩，养蚕纺丝，织布制帛，学习女功。

古代女子学做女功有很多规矩。明秦淮寓客辑《绿窗女史》一书中收录不少古代“女性须知”，其中张淑英撰《刺绣图》一卷专门谈到了学做女功时的各种要求，女功集中在“品”“图”“法”“质”“器”“供”“忌”“候”八个字上，每个字代表一要求。首先要求女孩要有良好的品行，特别是学做工艺要求高的刺绣时，“品”为第一要求：“刺绣须蕙心妙质，静女、文姬及风神萧远，有林下风气者。”这话说得很明白：学刺绣的女孩子，必须具有纯美的内心，美好的气质，就像静女、文姬那样，或者是神韵潇洒，心态远逸，有林下风气的人。可见，古人对习女功者的素质要求的确是挺高的。

西汉女学者班昭在其《女诫》中曾提出“女有四行”观。所谓“四行”：“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”其中的“妇功”，即女功，要学会并掌握做针线活儿的本事，称为“学作”。唐宋尚宫《女论语·学作章》亦称：“凡为女子，须学女工。”

为什么古人强调女性一定要学会做针线活儿？除了长期修身养性需要，也是为将来嫁人妻、为人母做准备的。女功是持家过日子所必需的，如果针线活做不好，将来不只会影响家人生活质量，还会被邻居看不起，此即《女论语》中所谓：“针线粗率，为人所攻。嫁为人妇，耻辱门风。”所以说，会做针线活儿是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，也是做女人的基本功，顾名“女功”。



南宋佚名《女孝经图》中女子纺纱、做女功的场景（局部）

渐兴起，如当时的名人司马相如便“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”。

隋唐时实行府兵制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习射之风。府兵的兵士是从农民中征点的，白居易《新丰折臂翁·戒边功也》诗中所谓“无何天宝大征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”，说的就是此事。唐朝开考“武举”科，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，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“习射热”。《旧唐书·职官制二》称，“居常则皆习射。”

两宋时期，民间则出现了“弓箭社”“忠义巡社”等结社组织，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，冬闲时便于“庄井附近便处”，“教习武艺”。明清时兴盛的武术，就是在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例外的是元朝，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至元顺帝至正五年，朝廷禁止民间“习武”，持续多年的冬闲“习武热”变冷。直到明初，由于朱元璋十分重视民间武艺训练，习射练武才在民间重新兴起。据《明史·食物志一》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，“立民兵万户府，简民间武勇之人，编成队伍，以时操练，有事用以征战，无事复还为民。”自明朝起，习武便成为冬闲一景，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专业书籍，如明程宗猷便著有《耕余剩技》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在习射练武的同时，古人还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学习木工、瓦工这类生产劳动技能，民间称为“学艺”，以区别于“习武”。



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习射场景（摹绘）



孔子观乡人射（图见《孔子圣迹图》）

叁

闲时孩子上“冬学”

《新元史》：“农隙使子弟入学”



↑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古代学堂，房前正中坐者是老师，一仆人上茶，两侧厢房里学生正在学习（晚唐时期）

←汉代画像石中的上课场景

想学习文化知识的古人，则会利用冬闲时间“冬学”。南宋陆游《秋日郊居》诗中便提到了这种学习形式：“儿童冬学闹比邻，据案愚儒却自珍。授罢村书闭门睡，终年不著面看人。”

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，目的是启蒙教化。在古代，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，冬学解决了古人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，“识字班”“扫盲班”就属于这一类短期培训。

元朝设立的“社学”也是这种利用冬闲学习。元朝的社学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（公元1270年），朝廷设司农司并颁《农桑之制一十四条》，其中便包括有关兴办社学的规定。“社”是元朝的基层组织单位，每五十家为一社，设社长一人。据《新元史·食物志二》，“每社立学校一，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，农隙使子弟入学。”社学主要进行一般农桑知识启蒙教育和道德化管理，以提高公民的素质。

古代的冬学并不是随便学，如元朝的社学便有要求。据《续文献通考·职役考》，有的地方社学，会刻孔子画像，令学员祀之，并“印识文簿，界社长记其善恶，季月报县，不孝悌，不事生业者，罚其输作”。从这点上看，社学将乡民社区管理和教化结合了起来——冬学成了一种社会管理手段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教师资源有限，“村庄各社请教学，多系粗识文字之人，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，枉误后人。”意思是说，有的冬学教师连字的读音都拿不准。《通制条格》记载，元朝廷就此要求州县学官处（教育局）对教师进行培训，“将各经校正点读句读，音义归一，不致讹舛，如此庶免传习差误。”

到明朝，经过元末长期战争，各地社学早已停办。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3年），朱元璋始命复设社学，但仍有不少地方的社学未能恢复。据《宣宗实录》，宣德六年（1431年），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上疏朝廷称：“四川诸府县社学久废，民不知教，所以争讼多而礼让少。”

明英宗时，社学教育被纳入提学官的管理职责内。《英宗实录》附《景帝实录》记载，当时的礼部仪制司郎中韦纶建议：“乡都社学择良家子弟训诲之，每四季各赴提督官处考校，俾进德修业。”

但古人是否选择参加冬学，也要看自愿，并不强求。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，朝廷曾“令民间子弟愿入学者听，其贫乏不愿者勿强”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